

中国经济增长之路分析

郭路¹ 魏杨²

(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2.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北京 100875)

[摘要]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加入有关中国特色的经济分析后,增长理论依然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中呈现出了竞争性的民营经济与垄断性的国有经济的二元特征;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因为改革初期人均资本存量太低,但伴随人均资本存量的逐步提升,资本收益率持续下降,尤其是在 2012 年后,我国经济已开始向稳态收敛。因此,为维持一定的增长,除了增加具有正外部性生产要素供给以外,可以通过让具有垄断力的国有经济走出国内,以维持国内经济增长。尽管垄断国有经济的外部扩张,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国内经济增长下降的趋势,但当扩张结束后,中国经济增长还是会收敛到稳态。

[关键词] 经济增长;欧拉方程;外部性

[DOI 编码] 10.13962/j.cnki.37-1486/f.2019.06.005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410(2019)06-0049-08

一、理论背景

本文所使用的经济分析工具是经典的拉姆齐分析、Lucas (1988)^[1]的人力资本、Romer (1990)^[2]的内生技术分析与 Aghion 和 Howitt (1992)^[3]的“创造性毁灭”;另外在分析财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使用了 Guo (2017)^[4]的分析思路。在经典增长工作中,往往假设市场是竞争性的,当生产是规模报酬不变时,经济的稳态增长为零。经典拉姆齐经济的特征是:当经济中的资本存量小于稳态的资本存量时(较低水平的资本存量使资本的边际产出相比于稳态时的资本边际产出要高)会出现短期的经济增长,但增长会最终收敛到零。

Lucas 在吸收“干中学”思想后^①,使得生产函数不再为规模报酬不变,并假定了外部性特征的生产要素具有不变的外生增长率,从而保证了经济具有长期稳态增长。Romer (1990)^[2]不同于 Lucas (1988)^[1]之处是生产函数仍然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只要满足类似于 Lucas (1988)^[1]的假设条件,即拥有外部性特征的生产要素具有外生增长时,也可以使经济具有增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异质性经济、结构内生与宏观稳定研究”(17BJL12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美实际经济规模比较研究”(71873019)

[作者简介] 郭路(1973-),男,新疆乌鲁木齐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经济增长理论、一般均衡。

^①虽然 Lucas 和 Moll (2014)^[26]也分析了学习效应能保证经济具有一定的增长,这种情况只有在知识是无穷大时才能保证经济中具有持续的学习效应,这显然有问题。

长。Aghion 和 Howitt(1992)^[3]放松了竞争性市场的假设,即当创新的厂商在产品市场中具有垄断力时,且厂商的创新可以无偿扩散到其他厂商时,创新使经济具有一定的增长率。

从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当经济没有持续的外部性要素供给,且生产是规模报酬不变时,在竞争性的市场上,经济稳态增长会趋于零;当经济具有持续的外部性供给,即使生产规模报酬是不变,经济会有增长率。由于生产的外部性、垄断和规模报酬递增都会使欧拉方程的等号变成不等号,在具有经济增长的经济中,往往会出现欧拉方程是不等号的情况,或者说某些导致欧拉方程是不等号的因素会导致经济增长。某些情况下,政府财政行为会保证经济中具有持续的外部性要素供给并导致经济增长(Guo,2017)^[4],但这种财政行为只能使增长达到 Romer(1990)^[2]稳态增长的状况,因此当财政考虑经济增长时,其行为需要匹配该经济的稳态增长。

二、历史回顾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逐步走上市场化的道路。在市场化的逐步推进和我国固有的经济、政治治理模式的双重因素影响下,我国经济出现了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品、生产要素的定价逐渐从政府定价向市场定价转变。二是民营企业的规模逐步扩大,并最终在整个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民营企业往往生存于垄断性国有企业不愿进入的竞争性领域,这使我国的经济结构出现二元化的特征:竞争性的民营企业和垄断性的国有企业。由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因此在以下的分析中,本文把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的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的时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时期。

(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的经济增长动因分析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人均财富水平极低,在生产方面表现为人均资本存量极低,造成生产的资本收益率很高;Bai、Hsieh 和 Qian(2006)^[6]测算在1999年之前,我国的资本回报率在20%以上;另外宋国青、卢锋、唐杰等(2007)^[7]测算到2006年时民营经济的资本收益率远高于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即使方文全(2012)^[8]测算我国1993年后的资本收益率,发现1993-2007年间我国的税前名义资本收益率在10%至15%之间,税后实际资本收益率在6.9%至12.9%之间,但仍比同期美国的资本收益率要高得多^①。尽管外国资本对中国是否能长期坚持开放的政策持有一定的怀疑,但面对如此之高的资本收益率时,对中国的投资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在开放初期,外商无法做到自由投资,我国通过贸易赤字来增加当期资本存量;另外在这个阶段,开放政策不仅促进了外向型国有经济的发展,也同时促进了外向型民营经济的发展,为以后民营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在我国国际贸易产品选择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了相当大的重视,这些产业成为我国创汇的重要支柱。

可以看到,民营经济在此阶段是以国有经济的补充形式得到承认与发展的,民营经济不得不在国有经济的夹缝中生存与发展。为了生存,民营经济不得不参与激烈的竞争并逐步壮大自身。而随着民营经济规模的扩大,市场化的程度也逐渐加深。另一方面,国有经济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尤其是大型的国有企业往往是某一领域的垄断者,其生产经营往往受到地方政府的安排。这使得我国经济出现了二元化的特征:竞争性的民营经济与垄断性的国有经济。

^①根据 Shirller 的测算,美国 1978-2012 年间的资本收益平均率为 6.25%。

由于国际贸易规模的逐步扩大,使得可贸易品的定价为国际“一价率”,这种“一价率”也同时倒逼我国在某些领域逐步放弃政府定价,非贸易产品、生产要素市场化定价程度逐渐加深。在这个阶段,虽然我国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可以看出,这个阶段的增长源自于我国人均资本存量太低,在开放的情况下,产品、生产要素的价格逐步向国外看齐,国内资本价格远大于资本折旧率和时间贴现率之和,这使我国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潜力。开放后,现代化的生产管理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国内,这种相对先进的管理方式也逐步扩散到整个经济之中,这种扩散对经济产生了正外部性,并带来了经济增长。外部性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很难评估,考虑到同期世界经济增长,在这个阶段人均资本存量过低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因。

为了维持长期增长,我国采取了压低劳动力价格,提高资本价格的措施。这表现为随着开放规模的扩大,我国采取鼓励出口的政策,使得我国国际贸易盈余增大并持有更多的国际储备,国际贸易盈余减缓了国内资本积累的速度,进而减缓由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本收益率下降的速度,从而保证了一定的经济增长潜力。影响资本收益率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外商直接投资,从1984-1991年间虽然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速很大,但相比于国际贸易盈余来说其规模并不大,自1992年起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速迅速增加,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已经是1984年的近40倍。按照Bai、Hsieh和Qion等(2006)^[6],宋国青、卢锋、唐杰等(2007)^[7],方文全(2012)^[8]等人的研究,在此阶段,我国资本收益率并没有发生显著的下降,可见虽然此阶段的经济增长较快,但资本的积累并不是很快。造成此状况的原因除了外贸部门的盈余抵消了部分资本积累外;还因为农业部门生产效率的提升大量的富余农村劳动力进入到制造业部门以维持较高的资本-劳动收益比。由于资本积累并不显著,这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高增长打下了基础。

(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经济增长动因分析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产品、生产要素的国际市场定价愈发明显,生产中资本积累不再完全由政府和企业主导,外向型的民营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积累的作用不断加强。此阶段,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愈发紧密,中国经济中的定价逐渐从政府定价向市场定价转变,由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还不小,在许多市场上是一个价格接受者,同时要素价格均等化趋势也使我国生产要素的定价逐步向国际市场看齐,我国经济中竞争性的特点愈发明显。

尤其随着决策灵活、规模较小的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大量民营经济在竞争性市场中成长的同时吸纳了大量富余劳动力,这使民营经济成为我国国际储备的一个重要来源(李巍,2009)^[9]。同时期,虽然国有经济的比重也出现下降,但它们的垄断力量更强大,(陈林、朱卫平,2012)^[10],尤其是在2008年以后,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加强。而是更多地依赖于行政垄断。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有些学者认为国有垄断经济会促进我国经济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如杨瑞龙(2017)^[11],但本文认为其分析缺乏一定的学理基础。即使国有经济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特征,但由于国有经济在历史上是通过财政支付的形式得到建立与发展,这意味着国有经济提供的所谓公共品具有价格特征。另外在封闭经济中,国有经济是无法长期提供正外部性要素,这使经济依旧会收敛到零增长。

在这个阶段我国劳动力的价格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由此带来了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较大的比较优势。同时,上述因素导致该时期国内资本-劳动力价格明显偏高,这保证了我国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升,我国有意压低了劳动力的相对工资,并通过鼓励出口的政策抬高资本收益率,这产生了大量的国际贸易盈余,使国内的资本收益率维持在高水平上。上述安排,在保证国内工资水平相对上升的同时(程承坪、张旭、程莉,2012)^[12],使劳动力收入在产出中的比重下降(赵秋运、魏下海、张建武,2012年^[13];赵秋运、张建武,2013^[14])以保证我国经济的高增长(王家庭、李艳旭、马洪福等,2019)^[15];陆江源、张平、袁富华等(2018)^[16]发现我国在2000-2014年间的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助推了资产价格的膨胀。

虽然这种经济政策可以在一定的时期内维持较高的增长,但这种高增长不可持续,因为高增长必然会带来国内资本积累,并引起资本收益率下降。另一方面我国中央、地方政府的公共投入同期也在不断加大,由于厂商对公共品所支付的价格远低于其在生产中的边际产出,从而公共投入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以上两个因素造成了我国在此阶段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应该明确的是,在该阶段维持较高的资本回报率相比于公共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

较高的资本回报率最终会使增长收敛到稳态,我国经济增长率和资本收益率必然会出现会逐步下降的趋势^①。因此为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速与弥补公共建设方面的不足,政府加大在公共品方面的投入。但随着公共品的增长势必会导致生产中公共品边际产出递减,公共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下降。由此当考虑到最优的公共品规模时,我国财政对公共品的投入增速也出现了减缓。另外,由于政府财政在公共品供给中需要满足预算平衡约束,因此财政收入规模限制了政府所能提供公共品的规模。且由于我国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生产环节,政府对生产者的税收可以理解为消费者对公共品所支付的价格,这使得公共品不再具有外部性的特征;特别是当公共品的边际产出等于税率时,公共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不再存在。

考虑经济增长导致本国资本存量提升,尤其是在国际贸易顺差出现减缓后,势必会加快资本形成。由于资本存量的提升将导致国内资本收益率出现下降,且伴随着要素价格均等化经济增长呈现出收敛态势。另外通过增加公共投资来维持的经济增长也开始迅速收敛(高军、刘博敏,2013^[18];范庆泉、周县华、潘文卿,2015^[19]),使得通过增加公共投入来维持高增长也不再可行。根据方文全(2012)^[8]的测算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尤其是在2009年-2012年间,资本收益率出现了显著下降,同时公共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出现了下降;柏培文、许捷(2018)^[20]发现中国2006年后三产的资本收益率都呈加速收敛的状态;这意味中国高经济增长不再是常态!另外,在经济结构方面,钢铁、有色、能源等存在大量投资,资本收益率下降的很快,政府也无法提供足够的激励来提升这些行业的资本收益率,因此就需要把社会资本引入到资本收益率较高的行业中(张同斌、高铁梅,2012^[21];于斌斌,2015^[22]),这样为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我国不得不实行产业结构调整,这就是中央出台“供给侧改革”“中国制造2025”计

①许捷、柏培文(2017)^[17]认为我国1978-2014年间的资本深化是造成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长下降的主要原因。

划的宏观背景。

总体看来,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经济增长迅速提高,国际贸易盈余和国际储备迅速增加,国内竞争性的民营经济与垄断性的国有经济二元特征愈加明显。由于经济持续增长,使国内资本得到一定程度的积累,相比之前的资本收益率,该阶段的收益率不断降低。逐步降低的资本收益率意味着经济增长率也将呈现下降的趋势。虽然同时期鼓励出口的经济政策使国际贸易盈余与国际储备迅速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国内资本的积累,但高增长带来的高资本累积完全抵消了由国际贸易盈余所产生的资本存量减少。因此,在该阶段中国经济所体现的特征是逐步消化大量富余劳动力,经济增长逐渐收敛到稳态(刘仁和、陈英楠、吉晓萌等(2018)^[23]认为中国的稳态增长率和西方主要经济体的稳态增长率很接近);竞争性领域的民营企业有一定的壮大,国有经济的垄断力量进一步加强。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历史,由历史原因造成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均资本存量过低,导致了高资本边际产出,资本收益率严重偏离稳态收益率,使我国当时具有非常大的经济增长潜力。随着经济增长,我国经济出现了竞争性的民营经济与垄断性的国有经济共存的现象。在逐步市场化的过程中,我国资本收益率不断向稳态收敛,尤其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资本收益率的收敛明显加快。同时,依靠财政提供的正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逐步降低,这使我国经济根本无法维持长期高增长,经济增长必然呈现出下滑态势。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只有突破生产函数的欧拉方程等式约束才能够引发长期的稳态增长。为此,下文将分析中央政府如何通过政策安排使欧拉方程等式不再成立。

三、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展望

在当下国内资本收益率逐渐下降,许多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增长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因为依据经典的拉姆齐分析框架,只有当经济中生产函数的欧拉方程不满足等式时,才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稳态增长。就目前我国真实经济来看,公共品在短期内无法使欧拉方程不等式成立,故我国选择依靠垄断来满足欧拉方程不等式。但是在封闭经济中垄断会带来供给不足,无法取得长期经济增长,因此,创新成为唯一选择。

在真实经济中,创新分为企业创新和公共创新。在企业创新方面,即使对企业给予了足够的激励与保护使它们自主创新并拥有一定的创新垄断利润,但如果企业的创新没有扩散效应的话,整个经济并不会出现增长。由于接收科研成果的企业会以各种形式向科研单位与高校支付费用,这样公共科研部门就成为企业的研发部门,此时公共科研部门的外部性特征也就消失了。因此,仅仅通过将科研单位与高校的成果产业化与市场化的研发模式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企业的创新仅仅是某种形式的物质与人力资本的投入,这种创新不但具有价格特征还具有排他性,并不会导致长期经济增长。在公共创新方面,只有具有外部性特征的要素供给可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但由于这种要素不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因此对计划者来说与其自己做这类研发,不如直接使用已有的科研成果(Acemoglu 等,2015)^[24]。

考虑到我国经济同时具备竞争-垄断的二元特征,长期的经济增长使得垄断性的国有经济具有了很强的经济实力。虽然垄断经济在国家内部根本无法促进经济增长,还降低了财富的积累。但当这些垄断经济走向国门后,情况就出现了极大的改观:即国有企业是对内竞争,

对外垄断,这就使经济中的生产函数不再满足等式欧拉方程,从而保证了经济的一定程度增长。从近期情况来看,我们确实可以观测到越来越多的垄断性企业走出了国门,并通过海外直接投资来进行全球产业布局。由于垄断企业具有相当的实力,且国企在出海的过程中,往往能得到国家的财政支持,由此保证了其产品与服务具有相当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在一定时期内,随着垄断性企业在国际上掠地攻城,不断产生的垄断利润会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内的经济增长(王一鸣,2017)^[25]。但需要澄清:单纯的垄断经济不会产生长期增长。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现今国家的整体战略将是稳住国内竞争性经济,加强对外的垄断性经济,并借助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行动计划、以及“中国制造2025”等一系列发展规划,推动我国的垄断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张。当垄断性的国有经济在外部市场上能获得足够的垄断利润时,也会刺激国内经济规模的扩张,并深化市场分工使竞争性的民营经济能间接参与全球竞争。由于这种扩张可以使生产函数不再满足等式欧拉方程,这样即使在竞争性经济的条件下,经济依然会出现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扩张的结束,即使我国垄断经济能维持一定的外部垄断利润,但其垄断利润不具有增长的属性,因此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经济的增长一定会收敛到稳态增长。或者说中国积极的外部扩张会一定程度上减缓国内经济增长下降的趋势,但随着扩张的结束,中国经济增长还是会收敛到稳态。那么如何能提高与维持中国的稳态增长呢?我国相比于西方的国家有一个显著的优势:强力的中央与地方政府,政府可以对中国长期增长未雨绸缪,把资源一定程度上转移到能带来长期正外部性生产要素的供给方面,如在医疗卫生和基础教育方面增加投入等。

四、结论

本文总结了主流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并回顾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增长的情况,最后对未来我国经济增长作出判断。在依据主流经济理论基本框架对加入有关中国经济因素进行分析后,本文认为主流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所示:

1.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当在竞争性市场中,厂商的生产函数如果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则该经济无增长;当经济中具有正外部性效应的生产要素时,该经济具有增长;当厂商具有一定的垄断能力且其某个新技术能扩散到整个经济时,经济存在稳态增长。另外当经济具有增长时,竞争性厂商的生产函数的欧拉方程则表现为不等式;当经济无增长时,竞争性厂商的生产函数的欧拉方程则表现为等式。

2.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市场化程度逐渐加深,经济中出现了竞争性的民营经济与垄断性的国有经济的二元特征。另外我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是因为改革初期我国人均资本存量太低,资本收益率非常高,使得我国具有高增长的潜力;随着我国经济长时期的快速增长,人均资本存量已明显提升,资本收益率持续下降,尤其是在2012年以后资本收益率的下降已使我国经济高增长不再具有持续性。我国为维持一定的增长,除了增加具有正外部性生产要素供给以外,还强化了国有经济的垄断力量,争取在外部市场中产生一定的垄断利润,使生产函数的欧拉方程为不等式,从而在一定时期内,保证我国的经济增长。

3.在对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判断中,依赖于“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发

展规划,具有垄断力的国有经济的外部扩张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国内经济增长下降的趋势,但随着扩张的结束,中国经济增长还是会收敛到稳态。“中国制造 2025”促进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把资本从收益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了收益率较高的部门以保证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 [1] Lucas 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1): 3-42.
- [2] Romer P.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5): 71-102.
- [3] Aghion P, Howitt P.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J]. Econometrica, 1992, 60(2): 323-351.
- [4] Guo Lu. The optimal fiscal externalities expenditure—an analysis on China government affiliated institutions redundancy[R].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orking paper, 2017, (08).
- [5] Arrow K.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2, 29(3): 155-173.
- [6] Bai Chongren, Hsieh C, Qian Yinyi. The return to capital in China[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06, 37(2): 61-102.
- [7] 宋国青, 卢锋, 唐杰, 等. 我国资本回报率估测: 1978-2006[J]. 经济学(季刊), 2007, (03): 723-758.
- [8] 方文全.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有多高?——年份资本视角的宏观数据再估测[J]. 经济学(季刊), 2012, (05): 521-540.
- [9] 李巍. 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与国内就业率[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9, (11): 116-127.
- [10] 陈林, 朱卫平. 经济国有化与行政垄断制度的发展——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经济史研究[J]. 财经研究, 2012, (03): 49-58.
- [11] 杨瑞龙. 新时期新国企的新改革思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逻辑、路径与实施[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7, (05): 5-24.
- [12] 程承坪, 张旭, 程莉. 工资增长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 1980-2008 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软科学, 2012, (04): 60-67.
- [13] 赵秋运, 魏下海, 张建武. 国际贸易、工资刚性和劳动收入份额[J]. 南开经济研究, 2012, (02): 37-52.
- [14] 赵秋运, 张建武.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及其驱动机制新解——基于国际贸易和最低工资的视角[J]. 金融研究, 2013, (12): 44-56.
- [15] 王家庭, 李艳旭, 马洪福, 等. 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动能转换: 资本驱动还是技术驱动[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 (05): 99-117.
- [16] 陆江源, 张平, 袁富华, 等. 结构演进、诱致失灵与效率补偿[J]. 经济研究, 2018, (09): 4-19.
- [17] 许捷, 柏培文. 中国资本回报率嬗变之谜[J]. 中国工业经济, 2017, (07): 43-61.
- [18] 高军, 刘博敏. 财政支出可以长期促进经济增长吗——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J]. 宏观经济研究, 2013, (06): 48-53.
- [19] 范庆泉, 周县华, 潘文卿. 从生产性财政支出效率看规模优化: 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J]. 南开经济研究, 2015, (05): 14-39.
- [20] 柏培文, 许捷. 中国三大产业的资本存量、资本回报率及其收敛性: 1978-2013[J]. 经济学(季刊), 2018, (04): 1171-1206.
- [21] 张同斌, 高铁梅. 财税政策激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J]. 经济研究, 2012, (05): 58-

70.

[22] 于斌斌.产业结构调整与生产率提升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中国城市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5,(12):83-98.

[23] 刘仁和,陈英楠,吉晓萌,等.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基于 q 理论的估算[J].经济研究,2012,(06):67-81.

[24] Acemoglu D, Gancia G, Zilibotti F. Offshoring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15,7(3):84-122.

[25] 王一鸣.中国经济新一轮动力转换与路径选择[J].管理世界,2017,(02):1-14.

[26] Lucas R, Moll B. Knowledge growth and the allocation of tim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4, 122(1):1-51.

(责任编辑:杨 磊)

The Analysi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Choice

GUO Lu¹, WEI Yang²

(1.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2.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By addi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o the neoclassical growth theory, the growth theory can also show good explanation to China's growth.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 policy, the Chinese economy appears dual characteristics with coexistence of competitive private economy and monopolistic state-owned economy. The continuous high growth rate of China's economy was due to the low capital stock per capit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However, with the gradual increase of capital stock per capita, the profitability of capital decreased, especially after the year of 2012, China's growth rate has begun to converge to its steady state. Consequently,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growth, the monopolistic state-owned companies could go out of the country besides increasing the supply of production elements generating positive externalities. Although the external expansion of monopolistic state-owned economy can slow down the downtrend of domestic growth to a certain exten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will converge to its steady state after the expansion.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Euler equation; Externality

